



——| 中国文学知识 大课堂 |——

ZhongguoWenxueZhishiDAKETANG



萧 枫·主编

香港文学发展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

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

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辽海出版社

中国文学知识大课堂第十八讲

香港文学发展

萧 枫 主编

辽海出版社

目 录

香港早期新文学的演进

新旧文学的并行和交替	(1)
香港新文学的兴起	(5)
新文学作家的创作	(9)

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

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与创作	(12)
端木蕻良的创作	(19)
萧乾的创作	(20)
夏衍的创作	(21)
戴望舒及其他南下诗人的创作	(23)
香港青年作家的创作	(30)

战后的香港文学

战后香港的文学期刊和《华商报》	(32)
郭沫若、茅盾与战后香港文坛	(36)
司马文森、陈残云的小说创作	(40)
香港本土作家的创作成就	(43)

香港小说

香港小说发展的格局	(50)
本土作家的崛起	(59)
新武侠小说的崛起	(72)
金庸的新武侠小说	(74)
言情小说的盛行	(83)
南宫搏、董千里、高旅等的历史小说	(90)

香港诗歌

力匡、何达、舒巷城的诗	(96)
马朗和香港早期的现代诗人	(104)
蔡炎培、戴天、温健骝的诗	(110)

香港散文

散文传统的地域推移和文化变异	(118)
叶灵凤和曹聚仁的散文创作	(123)
徐讦、徐速等的散文创作	(133)

香港早期新文学的演进

新旧文学的并行和交替

在 20 世纪初期的香港文坛，旧文学所处的正宗地位并未被新文学所代替。然而，“五四”新思潮和“五四”新文学所显示的时代新方向，所反映的历史新潮流，对于香港文坛的渗透，毕竟是从甚微之势，逐渐地产生了一些潜在的影响，并且，开始吸引了一些作家和部分文学青年，去接受新文学的熏陶，他们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写作了。

这一时期出现的《双声》杂志，由孙中山先生倡办的《大光报》主创于 1921 年 10 月，该刊的主编是思想较新潮的黄昆仑和黄天石，他们都是新思潮的青年作者代表。《双声》的主要作者，也包括上海的徐枕亚、周瘦鹃、徐天啸、吴双热、许厘父等。而香港本地的一些年轻作者，则以香港作为小说的背景，用半白话和白话文体写作。比如黄天石发表在《双声》第 2 期的小说《谁之妻》，表现了香港青年在国内反封建浪潮影响下，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恋爱自由的斗争。女教师兰依与有妇之夫云屏私恋，而云屏的弟弟锦涛留法前夕，心爱兰依而又不肯启齿求爱。兰依与云屏情爱日深，一日，云屏从报纸上看到载有留法学生的船只触礁沉没，便以为弟弟也无以生还。于是，云屏按照广东嫁鬼的陋习，迎兰依入门，名誉上是让她嫁给弟弟，实则仍与兰依私恋，终于导致兰依有了身孕。忽一日，兰依收到锦涛从法国寄来的信，说他在“舟覆之时，幸习泅泳，幸免于死”，被一侨胞

救起。兰依阅信后叹道：“我将为谁之妻？”这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抨击了香港的晚清遗老遗少，在当时多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尽管，小说运用的并非完全的白话，而是从文言文体中变化出来的半白话文体，被称为“放脚式”白话文，然而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与《双声》差不多同时创刊的《妙谛小说》，由《共和报》代理主办，发行到国内外，是20年代香港文学期刊流出国外的开始，内容亦多为“鸳鸯蝴蝶派”作品，但它与《双声》一样，也开始出现少量的白话文。比如第四期有西琅的《兵威压迫下的华侨》，叙述了一队士兵在“兵头”的率领下到乡下去“捉贼安民”的经过，诉说了华侨受到侨居国民族歧视的遭遇，小说的语言确乎比《谁之妻》更为“白”了一些。在《双声》和《妙谛小说》的推动下，香港的一些文学期刊，逐渐出现了文言与白话并存共处的现象，构成了香港早期新文学的一线熹微。

创刊于1924年9月的《小说星期刊》，多数文章还是文言文，但也出现了部分的白话文。它每期的短篇小说中约有1/3是白话文；而连载小说中，大部分是用白话文写成的。如吴灞陵的《学海燃犀录》和许梦留的《一天消息》等。吴霸凌的另一篇小说《死》，叙述小尧因为迷信媳妇“不乐家”的习俗，于是“禁媳妇归宁”，导致媳妇自杀的故事，小说揭露大男子主义的危害性，控诉了封建迷信的陈规陋习。尽管小说全无结构与技巧可言，但通篇用的是流畅的白话文，表达的又是新的思想观念，可以说也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坛，处在新旧交替的一个转折点上，对于“五四”新文学的接受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保守的一面。当时的文学期刊，双如《小说星期刊》，就发表了拥护旧文学的《四六骈文之概要》的文章，也发表了提倡新文学的《新诗的地位》的文章。比较典型的作者如罗丰铭，他自己不写白话文小说，但也并不排斥白话文。他在《小说星期刊》上发表的《新旧文学

之研究和批评》一文，就指出：“白话文之短处在乎不用文言，文言之长处在乎能用白话。”可以看出其主张是折衷的。《小说星期刊》可以说是香港新旧文学交替时期的一份重要文学期刊，从当时的情形看，这个刊物发表的大多是用典雅古文刺绣出来的有关风花雪月的故事，但也没有完全排斥白话文。从《小说星期刊》的立场看，尽管它采取了文言与白话共存，新旧文学观念兼收并蓄的态度，但也反映了当时香港文坛出现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展示出香港文学进入了文言与白话之消长、交替的过渡阶段。后来的文学工作者描述这一经历时，说那是一种“不尴不尬的情形”，具体就表现“在同一报章的副刊上，或是一个刊物上，新旧文学的并行”。

这确乎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也是一个混乱和冲突的时期。当时香港爱好新文学的青年对此反应尤为强烈，他们在本港少数书店里买到由上海运来的新文艺杂志，接受新文学的熏陶，并开始为报纸副刊写作。这其中比较活跃的有谢晨光，侣伦、张吻冰、岑卓云、张弓、刘火子、李育中、易椿年等，他们成为当时的《大同日报》、《南华日报》等副刊的作者。其他的如《大光报》、《循环日报》、《华侨日报》等副刊，也开始容纳新文学作品。

随着白话文小说的出现，新诗在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坛也稍露面目。《小说星期刊》在1925年第1期发表了许梦留的《新诗的地位》的文章。在第2期中，许梦留又引用了胡怀琛与俞平伯的话，为新诗作了辩护，认为旧诗中因束缚的阻碍，就成呆板的、勉强的、虚伪的、狭窄的作品，没有诗的真意义，而新诗就要“适应环境而生相异的状态”。不过，应该指出，这一时期香港文坛出现的新诗，由于刚开始尝试用白话，到底显得过于“白”和直露，几乎没有什么艺术性和美感可言，这种现象，几乎成了当时香港文坛的一种通病。但对香港新文学的萌芽情形来说，这确乎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它所预示的前景是有希望的。

新文学的进入无疑构成了香港早期文坛的一种可喜的景象，然而，正因为是处在新旧交替时期，旧的封建的乃至低级趣味的东西，仍然存在于香港这块土地上。《小说旬报》便是当时的一个代表。该刊只存一期，未注明出版日期，但窥其风格文字，当为 20 年代的刊物。这个刊物以小说及谐趣诗文为主，沿袭了 20 年代香港报纸以谐部为副刊的风气。在这个刊物发表的所有小说或非小说文字，都写到香港地区伶妓之事，用的又是典型的旧式落难文人的骈四体裁。这样既是文言，表达的又是狭邪的、不健康的思想观念和情调的文字，在香港 20 年代的文坛上，无疑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香港新文学的兴起

香港新文学的真正兴起是在 1927 年以后。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北伐战争胜利，代表旧势力的军阀被打倒，代表旧文化的国粹派，也开始放弃香港这个避居的堡垒。国内的新文学运动已经蓬勃发展，“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以及其他社团的文学作品，渐次输入香港，对于香港文坛和文学青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当然，从内因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它在香港早期文学发展历史上，是一种必然性的结果。由于从 20 年代初期到中期出现了那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文言文、旧文学从处于正宗的统治地位，逐步向文白共处、新旧并存转化，从而开始了文言文与白话文消长、交替的过渡阶段。这种情形一直到 1927 年以后，香港文坛走出文白消长和新旧交替的浑沌过程，才开始呈现出实力对比的明显变化。

1927 年 2 月，鲁迅应邀从广州到香港，在香港青年会作了两次演讲，题目分别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的演讲，一方面抨击了封建主义的愚民政策，它使得大家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意思，大多数人听不懂，这等于无声。他主张现代人应该说现代的、自己的话，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另一方面，鲁迅对外国人利用中国的旧文化，去奴役中国人民的用心，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指出这种老调子也该唱完了。鲁迅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内涵和意义作了通俗的解说，指出这是一场文学革新、思想革新和社会革新的运动。

鲁迅的演讲，引起了香港当局和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恐慌，他们先是“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但

是，香港青年对于鲁迅的演讲还是极为欢迎的，并且反应热烈。鲁迅回到内地后，写了《略谈香港》、《述香港恭祝圣诞》和《再说香港》三篇文章，表达了他对香港新思想和新文学发展的关注和信心。

鲁迅在香港的活动，对于已经初步接受了“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学熏陶的香港文学青年来说，是一次极为深刻的启迪和有利的促进。同时，对于正处于文白消长和新旧交替过程中的香港文坛来说，其实力对比的变化也由于鲁迅的热忱鼓励，更展示出可喜的进步，从而使得香港文坛终于能够冲破旧势力的阻挠和多年的黑暗，迎来了1927年的香港新文学的兴起。

反映出香港新文学的兴起的标志，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报纸副刊展现出新文学的气象。从1927年开始，香港报纸差不多每一种都辟有一个新文学副刊，纯粹登载新文学作品。这里面有《大光报》的“大光文艺”副刊；《循环日报》的“灯塔”副刊；《大同日报》“大同世界”副刊；《南强日报》的“过渡”副刊；《华侨日报》的“华岳”副刊；《南华日报》的“劲草”副刊以及《天南日报》的“明灯”副刊等等。

报纸副刊向着新文学转化，这在当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一种大幅度的转向。根据贝茜的回忆，在这以前的报纸副刊，每天登载的都是“未刊完的古旧作品”，“新文学要想从其间不必说占一个地位，就是透一丝气也非常的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半是报纸方面为着适应一般小市民的兴趣的要求”。而后来报纸副刊所发生的变化，除了那一时期在“政治上是个兴奋局面”，此外，国内革命形势的高涨，使得“香港青年的精神上是感着相当的震撼。把这冥顽不灵的社会中青年的醒觉反映于事实上的，是新的追慕和旧的破坏，而直接表现出来的正是变化”。这样，觉醒的香港青年表现在文化方面的行动，便是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新文学作品，这就造成了报纸的副刊向着新文学转化的崭新的局面。

(2) 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创刊。这一时期，香港的报纸副刊致力于提倡新文学，显得颇为热闹。然而，一个纯粹的新文学刊物依然没有。直至1928年8月，才出现了被称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的《伴侣》杂志。《伴侣》的问世，对于香港新文学的历史，无疑是刻画了一个新的标志。这既是一本纯文学杂志，也是香港第一本纯白话文刊物。它遵循的是通俗文学路线，具有都市文学色彩。该刊同仁在一篇文章中说：“在能力尚弱的我们，对于大众所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建设上，也想效点绵薄的微劳的……这一条路是中国文艺一条新的出路，从事文艺的朋友部应该分任点开筑的责任。”该刊为半月刊，由张稚庐主编。刊物发表了沈从文、胡也频的小说，沈从文当时以“甲辰”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居住二楼的人》。该刊还培植了香港第一批新文学作者，如侣伦、张吻冰、岑卓云、谢晨光和陈灵谷等。《伴侣》曾通过征文形式出过两个专号：一是“初吻专号”，文章写的全是青年人的初吻经验；一是“情书专号”，发表了一批情书，酸甜苦辣。无所不有，全是出自情男情女的手笔。《伴侣》由著名画家司徒乔作插图。可惜到了1929年1月，这份纯文学杂志只出版了8期，便因销路不佳、经济拮据而停刊。《伴侣》的停刊，从另外的原因看，则是由于刊物的起点较高，尽管插图优美，文字轻松，“但从当时香港一般家庭的文化水平，是未必能接受的”；同时，由于刊物的“起步点亦是香港新文比的起步点，在这个起步点，是没有足够的读者来支持的”。

和《伴侣》同时期或更早一些时候出版的刊物，还有从广州移植来的《字纸篓》和本港出版的《墨花》。前者内容杂乱，倾向低级趣味；后者内容亦不纯正，只是几个以办刊物作消遣的有闲文人的玩意儿，这两个刊物对于新文学都无甚功绩。

(3) 第一个文学社团“岛上社”诞生。《伴侣》停刊后，其作者由于思想接近，志趣相投，在精神上形成一种默契，于是组织了一个新文学社团——“岛上社”。其名称由陈灵谷想出，

他当时从广东海丰来港，感到寂寞，于是便借小说来发泄他的牢骚。

“岛上社”成立后，最早的活动，是1929年春季着手编辑一本名为《岛上草》的同人作品全集。当他们把书稿寄到上海，由于上海的书店尚在筹划中，无法出版，《岛上草》于是胎死腹中。书稿中的作品，就分别交给香港的新文学报刊去发表。“岛上社”的成员还在香港《大同日报》副刊上编辑了一个定名为“岛上”的周刊。不过，“岛上社”在香港打的最响的一炮，是1929年9月创刊的纯文学刊物《铁马》，由张吻冰主编；内容仍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该刊由于缺乏经济后盾的支持，只出版一期便停刊。

《铁马》停刊后，香港的文学青年并未停止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于1930年4月又自费出版了文学杂志《岛上》，也只出了3期因缺乏财力而停刊。

刊物的相继停刊，经济当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而顽固的封建文化势力所维系的社会环境，也使得追随新思潮新文学的香港青年在现实面前连连碰壁。鲁迅当年到香港演讲时就形容道：“钉子之多，不胜枚举。”也正如吕伦所说：“主要原因是缺少了容许它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尽管，香港的文学青年面对恶劣的社会环境左冲右突，勇敢顽强地追求，同封建旧文学旧文化势力作斗争，然而，由于新文学处于草创时期，思想准备和经验都是不足的，这就难免使得刚刚兴起的香港新文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消沉。

新文学作家的创作

进入 30 年代，香港新文学处于一个转弯的年代，即由短暂的消沉进入另一个高潮，尽管文学刊物相继停刊，但文学青年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他们坚持写作，千方百计创办新的刊物，为新文学摇旗呐喊。

1931 年 10 月，香港的文学青年出版了一期《白猫现代文集》，转载国内作家如穆木天、张资平、郁达夫、陈学昭，王独清等的作品。这种转载性质的刊物在当时是不易行通的。于是第二年又有新的尝试，由张辉主编了《新命》和《晨光》两种刊物，作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可见有更多的香港青年加入了新文学的行列。后来，更有《南强日报》副刊“铁塔”，公开打出“欢迎无名作者”的旗号，以“严肃的态度，整齐的形式”，刊登了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

从 1931 年至 1937 年之间，又有《激流》、《春雷》、《今日诗歌》、《新命》、《晨光》、《时代风景》、《时代笔语》、《文艺漫话》、《南风》等刊物在香港问世。值得一提的是，《激流》并不像《伴侣》那样“以内容严整取胜，而是以态度之勇敢博得人的注意”，它的“香港文坛小话”一栏，“毅然地向所谓香港文坛算旧帐，向‘旧文坛’的盘踞者作正面的攻击”，这样的精神，“为前此的刊物所未见”，“也是那时候不得不有的精神”。1933 年，由于受到国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香港文坛出现了以发展和巩固“普罗”文学为旗帜的《春雷》和《小齿轮》杂志，《小齿轮》由鲁衡主编，他把刊物列为工农革命文学的一部分。《小齿轮》刊登的主要是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内容也是严肃的，但也只办了一期便停刊了。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期刊，维持的时间最久，且跨越了 30

年代中期，作者群亦跨越了30年代香港文坛主力“岛上社”成员的，就是1933年12月创刊的《红豆》月刊，它一直到1936年8月出版第4卷第6期后才停刊。该刊由梁国英药局主办，以纯文学为主，封面特地印上“诗与散文月刊之始”字样，是香港文学期刊中最具文学色彩和学术气氛的一份刊物。它的作者群包括侣伦、李育中、芦荻、路易士、林英强、陈江帆、侯汝华等人。1935年来到香港大学担任文学学院院长的作家许地山教授，翌年在《红豆》发表了《老鸦嘴》，为新文学助阵。可是，这也是该刊的最后一期，因为不合香港政府的出版条例而枯萎了。《红豆》在当时很受读者的喜爱，停刊之后，对香港新文学的发展，以及对许多的读者和作者而言，都是个不小的损失。

从创作的实绩来看，从1927年香港新文学最初的这十年间，香港的文学青年从新文学的拓荒、萌芽到兴起，从脱出新旧文学并行交替的格局到走出浑沌，迈向新文学的第一步，其创作的水平显然是在不断地提高。特别是30年代以后出现的作品，与20年代中后期相比较，题材日渐广阔，其中一些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香港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在艺术手法上，对于形象的塑造和白描手法也逐渐趋向自然和熟练。虽然，在吸取外国文学营养的过程中，还比较明显地出现模仿的痕迹，甚至于十足地欧化，但也有一些运用得比较自然的作品。

尽管，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青年受着中国新文学的启迪，学习并且摹仿了郁达夫以及创造社、太阳社等作家的风格，学习并且摹仿了沈从文的小说手法和新月派诗歌艺术，但他们大部分是借他山之石，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自己的切身感受。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青年出版了一些作品集，基本上以诗歌为主。其中有陈江帆的《南国风》，路易士的《行过的生命》和《上海飘流曲》，林英强的《蝙蝠星》、侯汝华的《海上谣》、伦

冠的《夜航》等。可见，新诗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还是比较喜欢接受和学习的。

在香港这些文学青年中，比较有成就和创作实力的，不能不提到侣伦。

侣伦（1911~1988），原名林下风，祖籍广东揭阳，生于香港。侣伦当时是以积极的文学青年的形态，加入到香港新文学的行列的。他15岁时，就在香港《大光报》副刊发表诗歌《睡狮集》，1928年在《伴侣》发表《殿薇》、《试》、《0的日记》等短篇小说，1930年在上海《北新》杂志“新进作家特号”发表小说《伏尔加船夫曲》。他的散文集《红茶》作为“岛上社丛书”之一，于1935年出版。他是最早运用形象化的白话文去刻画人物、记叙情节的青年作者。

侣伦是一位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高度责任感和自觉心的作者。他在《岛上》第1卷第2期发表的散文《夜声》，多是伤感的调子，带有点无病呻吟的习气。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立意不再写这样闲愁的文章，但一次、一次都依然懦弱，真是无法可想，但愿这是最末一篇了”，表现出了他对于文学创作的认真负责的态度。

香港的新文学从1927年的兴起，发展到1937年，已经从当初的新旧两种文学力量对比，基本上走完了一段复杂而艰辛的转化过程，这也是新文学从渗透到取代旧文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以后，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也由于内地作家的南来香港，而形成了香港新文学的另一个辉煌的局面，掀起了另一个文学活动的高潮，从而以其相对独立的形态，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大潮流。

抗战时期的香港文学

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与创作

茅盾（1896—1981），本名沈雁冰，原籍浙江桐乡县乌镇。队 1938 年起，他在香港有过三次较长时间的停留，第一次是 1938 年 2 月底至 1938 年 12 月底；第二次是 1941 年 3 月至 1942 年 1 月，第三次是 1946 年 4 月至 1949 年 12 月。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与创作，对香港文坛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而且也是他的创作活动的高潮期的主要部分。

抗战期间，茅盾在香港所作的两次逗留，第一次是在上海沦陷后，随内地作家南迁而携家眷来到香港；第二次是在新疆逗留一年多后，发现军阀已开始对文化人动干戈，便想方设法离开杀机四伏的新疆，在延安、重庆停留了数月之后，于“皖南事变”后再次来到香港。

茅盾在香港的这两个活动阶段，仍然以文学活动与创作为主。他把香港作为新文学的一个新的阵营，广泛开展文学活动，并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为香港的抗日救亡文艺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抗日文艺活动呐喊助威

作为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和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主要成员，茅盾到香港后数日，于 1938 年 3 月 12 日晚，出席了中毕艺术协进会主办的座谈会，并发表演讲。在回答“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时，他说：